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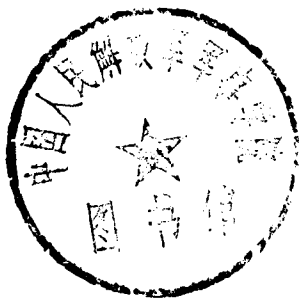
讨 论 集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讨论集

(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5/8 印张 296 千字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9,100 册

统一书号:2190·014 定价: 1.30 元

前 言

为了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批判“四人帮”在中国哲学史领域散布的一系列谬论，拨乱反正，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民大学哲学系、山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发起，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太原举行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问题讨论会。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七十一名代表。他们当中有长期从事哲学史研究工作的老专家，有中青年哲学史工作者，还有少数民族哲学史工作者和外国进修生。这是建国以后三十年来中国哲学史界的一次空前盛会。为了推进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大家感到对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会上就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对象、任务、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如何评价唯心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而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就是从这次讨论会收集的论文中选编的。编辑工作中不免有错误和不妥之处，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 | |
|--|-----------------|
| 谈怎样研究哲学史 | 汪子嵩 (1) |
| 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发展中国哲学史 | 杨宪邦 (15) |
| 哲学史的对象 | 李传明 (25) |
| 总结中国哲学遗产必须实事求是 | 汪国栋 (37) |
| 从日丹诺夫的定义谈起 | 李 申 (48) |
| | |
| 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石 峻 (57) |
| 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几点意见 | 张 建 (77) |
| 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钟肇鹏 (84) |
| 浅谈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于世君王 冶 王举忠 (98) |
| 清除中国哲学史中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错误 方法 | 潘富恩 (108) |
| | |
|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理论分析方法 | 张岱年 (121) |
| 也谈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 | 艾力农 (139) |
| 谈谈批判继承 | 岳辛研 (148) |
| 论关锋在哲学遗产继承问题上的形而上学思想 | 邓艾民 魏常海 (153) |
| 评关锋的所谓哲学继承 | 曾乐山 (169) |
| “字面意义继承法”为什么是错误的? | 韩 敬 (185) |
| “抽象继承法”是不能成立的 | 杨凤麟 (191) |
| 论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的统一及 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 | 乌恩溥 (197) |
| 谈谈关于批判继承与抽象继承的问题 | 许抗生 (210) |

| | | |
|--|-------------|-------|
| 如何看待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 | 任继愈 | (215) |
| 关于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 | 丁宝兰 | (220) |
| 关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依存和转化的 问题 | 贾顺先 邱明贵 刘蕴涛 | (231) |
| 对历史上哲学和阶级斗争关系的几点看法 | 李锦全 | (240) |
|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问题 | 谷 方 | (251) |
| 关于哲学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 | 吴熙钊 | (271) |
| 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哲学发展的关系问题 | 陈正夫 何植靖 | (277) |
| 关于“农民哲学”问题——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一种 时髦的思潮 | 李书有 | (287) |
| 试论农民阶级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葛荣晋 | (299) |
| 怎样评价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思想意识 | 冯达文 | (314) |
| 从墨子思想研究看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问题 | 刘邦富 刘树勳 | (325) |
| 从哲学史中的理论分析谈《老子》研究问题 | 王 明 | (336) |
| 从朱熹思想评价谈哲学史方法论的几个问题 | 张立文 | (345) |

谈怎样研究哲学史

汪 子 嵩

现在，我们搞哲学史工作的同志们正在展开关于哲学史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我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三十年来，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在这方面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其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从而改变了解放以前那种只是用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哲学史的情况。但是，在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思潮的影响。因此，现在要解放思想，总结这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让我们能更好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哲学史。我想就几个问题发表点不成熟的意见，和同志们讨论。

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

建国以来，日丹诺夫的《在关于亚历山大洛夫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对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是起了影响的。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批评了亚历山大洛夫的哲学史定义——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发展的历史；而提出他自己的哲学史定义——“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在进行的讨论中，我们有些同志主张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另外，有些同志还是坚持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从理论上讲，这两个定义是并不彼此排斥的。人类的认识是矛盾发展的历史，而认识的最根本的矛盾就是物质和意识的矛盾，在回答物质和意识何者是第一性时，就分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因此，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主要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

但是，我是倾向于讲哲学史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的。理由不仅是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经讲过：“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①更重要的是因为日丹诺夫的定义，在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起了不好的作用。按照他的定义，既然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对于每个哲学家、每个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都必须清清楚楚地归在唯物论一边，或者归到唯心论一边，双方必须进行尖锐的斗争；并且我们只能站在唯物论一边，把唯心论看作是我们的“敌人”；所以哲学史要以唯物论的发展为主线，是唯物论的发展史，如此等等。可是哲学史的实际往往并不就是这样。于是，在过去的哲学史研究中，不是以原则服从实际，却让实际服从定义，因而出现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简单化、贴标签等等情况。一九五七年，有些同志曾经提出过意见，后来因为百家争鸣的方针遭到破坏，一些正确的意见也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受到打击，使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一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在，对这些问题是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讨论了。

研究哲学史当然要区别哪些是唯物论，哪些是唯心论。但是，我们划定了每个哲学家的思想体系是唯物论或唯心论，是不是就算是完成了哲学史的任务呢？这样，就必须讨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史呢？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它发展的历史。但是，其它学科的研究者，比如物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者，除非是主要研究理论的，凡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9页。

是研究实用问题的人并不一定都要重视研究物理学史或者经济学史；唯独哲学史，却不但是哲学工作者，而且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以至实际工作者都最好能够读一读。哲学史起着比较特殊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都常引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旧序》中说的：学习哲学史是为了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①恩格斯这里讲的理论思维能力，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这是每个人都具有的，所以说是天赋的；虽然每个人都具有，但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却并不容易，这就需要锻炼，学习哲学史是锻炼这种能力的手段。

恩格斯随接举出例子：有些自然科学家因为对于哲学史不熟悉，所以把一些在哲学上早已废弃了的命题当作“全新的智慧”和“时髦的东西”加以宣扬^②。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多少年来，天才论、唯意志论能够通行无阻，一直到最近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有许多人反对，这不也是同样性质的问题吗？可见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来要求我们的干部都要读一点哲学史的重要性。

为了锻炼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唯心论的哲学家的思想体系，只到判定它是唯心论为止，那就只能说是做了一半工作，而且是不重要的那一半。列宁说得好：“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③我们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5页。

② 同上书，第466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做那些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者，只要把唯心论哲学宣判为胡说，加以唾弃就算完事，这样做是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的。

我们必须研究唯心论是在那一方面失足的，是把人类认识的那一方面绝对地夸大的结果。在这点上，每一个时代的唯心论哲学，每一个哲学家都是各自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把每一种唯心论哲学都摆到人类认识的发展历史中加以综合的研究；不能仅仅摘引一个哲学家的几句话，宣判他是唯心论完事，而是必须仔细研究他的著作，分析他的论证，才能判断他是在那一方面失足的。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

不但对于过去和现在的唯心论哲学需要这样做，而且对辩证唯物论以外的唯物论哲学也需要这样做。和唯心论相比较，唯物论是科学。每一时代的唯物论哲学都是从当时的科学中概括出来的，所以比起唯心论哲学来，是更接近科学一些。但是，科学在发展，唯物论哲学也在发展。科学向前发展了，回过头去看过去的科学，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不科学的地方。我们站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上，难道能说古代的朴素唯物论，以及后来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唯物论都是科学的吗？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他们站在正确的方面，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就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也是把人类认识的某一方面加以绝对夸大的结果，我们也要对这些加以分析，详细地分析这些唯物论哲学家的论证，找出他们失足的地方。同时也要看到：以往的这些唯物论者的缺陷，往往由一些唯心论者指出来并且加以利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中就是这样分析的：“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所以，对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历史，我们也不能公式化，将它看成总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的历史。有时候也可以是相反，唯心论在某些方面曾经战胜过唯物论，对哲学的发展起过促进的作用。

将哲学史当作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来研究，重要的是要总结人类认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以往的认识中，有许多是正确的，是真理，但是这些真理也都具有相对性，有它的局限性；有许多是错误，但是从错误中也可以吸取有益的教训。这样学习和研究哲学史，是不是可以少犯点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毛病？通过这样学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才是我们学习哲学史的目的。

哲学史研究什么？

关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现在已经提出一些问题，比如，古代的哲学是包括一切科学在内的，后来一门门科学独立出去，哲学的范围就缩小了。因此，我们现在研究哲学史，它的对象范围究竟多大？已经独立的科学，特别是一些和哲学有密切关系的，如美学、伦理学的思想，是不是都要排除在外？还有，为了要阐明一些哲学家的思想，不得不涉及他们对自然、对社会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思想，这些问题要如何处理？都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

但是，不管怎样，哲学史作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主要还是应该研究属于哲学本身的问题——即逻辑(本体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历史。为了研究这些问题发展的历史，我想，最好还是把握住几个最根本的哲学范畴，看它们在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是怎样发展变化的，这样就比较容易看出人类认识的发展，掌握哲学史发展的规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例如，关于一般和个别的问题。人类的认识都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最初人类从个别中认识一般，才能有语言，才有哲学和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从古代希腊哲学家来看，泰勒士开始要在万物中找到它们的基本根源，也就是要从个别中找一般。他们先找到了水、火、气，作为万物的根源，但是这些还是比较特殊的物质。后来，有些哲学家提出比较一般的物质概念，如“无限”、“种子”、“原子”。古希腊的唯物论哲学，就有这样的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过程。一般本来是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具有普遍性的方面或性质，但是，古代哲学家分不清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因而产生了各种问题。毕达哥拉斯学派讲的“数”，巴门尼德讲的“存在”，特别是柏拉图讲的“理念”，本来都是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物，它们只能在我们思想中才能单独存在，但是他们却将这些一般物当作和具体事物一样实在的东西，并且比具体事物更真实，是决定具体事物的东西。他们分不清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将一般看作是最真实的本体，就陷入了唯心论。列宁说：“原始的唯心主义认为：一般（概念、观念）是单个的存在物。这看来是野蛮的、骇人听闻的（确切些说，幼稚的）、荒谬的。可是现代的唯心主义，康德、黑格尔以及神的观念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完全是这样的）吗？”^①亚里士多德正是从这点上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不能独立存在，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一般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这个批判是很重要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自己也仍旧搞不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他在《形而上学》中提出的关于哲学的十几个问题，归结起来，主要仍旧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这些问题，企图作出解答，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辩证法思想，但又摆脱不了困境，陷入毫无办法的混乱之中。列宁说他：“妙得很！不怀疑外部世界的实在性。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现象和本质等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21页。

的辩证法。”^①不但古代哲学家弄不清这个问题，近代哲学家包括康德和黑格尔在内，也弄不清楚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认为，这个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共性和个性的问题，是辩证法的精髓；并且在理论上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但是，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将一般和个别混淆不清的情况，还是随处可见的。所以，从哲学史上研究人类对于一般和个别的问题的认识发展史，对于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是很必要的。

再拿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来说。最早的哲学家如赫拉克利特提出了“逻各斯”的思想，认为在千变万化的事物背后有必然的规律存在，这是人类认识史上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应该大写特写的。但是，这些规律究竟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也是人类认识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一直到近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兴起，哲学家从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视经验。培根是第一个系统地制定认识的归纳法的哲学家，他主张对大量的经验事实加以整理归纳，得出科学的客观规律来。但是，他的唯物论的经验论后来却遭到了种种唯心论者的反对：贝克莱认为凡是经验都是主观的，只是人的感知；休谟认为从客观的经验中不能得出因果规律来；康德认为因果只是人类先验的主观的形式，只有当它去整理经验材料时，才有规律；黑格尔认为只有绝对观念的发展，而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而已。他们都认为没有客观的规律存在。把黑格尔的唯心论哲学颠倒过来，就是唯物论：客观世界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认识只是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者在自然观上虽然是唯物论的，在社会历史观上却又摆脱不了唯心论。他们企图用物质的因素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但最后还是只能承认观念是决定的因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将唯物论在社会历史观上贯彻到底，认为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恩格斯在后期的通信中还特别强调了在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8页。

承认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时，必须承认精神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没有穷尽真理，它还是要在实践中发展的。到社会主义时期，就有人认为既然是无产阶级自觉地改造世界，也就可以自觉地创造规律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批评了这种意见，正确地指出：“人们能发现这些规律，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考虑到它们，利用它们以利于社会，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规律。”然而，人们在理论上承认这个道理，在实践中却又往往违反了它。比如斯大林自己就提出过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会越来越尖锐的规律。我们自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更是“创造”了不少错误的规律。这又是为什么呢？现在要研究这个问题，作为哲学史工作者，就要总结人类认识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让我们在认识上、理论上再提高一步。看来，关于客观规律和主观作用的关系问题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加以解决的，可能在千年万年以后，在人类认识规律的问题上，还会存在客观和主观的矛盾。

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说明：我们用某些哲学上重要的逻辑范畴，比如一般和个别，主观和客观，还有矛盾对立等等，以之作为主要线索，来研究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这样写出来的哲学史，就是本体论的发展史，认识论的发展史，以及辩证法的发展史。

黑格尔所说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我们研究和编写哲学史的重要方法。我想，如果按照逻辑线索来写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才可以做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当然，我们不能象黑格尔那样要历史的发展去服从他主观的逻辑，那是唯心论的辩证法。我们只能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客观历史中去研究逻辑的发展，探索主观认识的客观规律，才能真正做到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写出比较科学的哲学史来。

我们如果这样来研究哲学史，不是将一个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命题孤立地、静止地进行研究，而是历史地、发展地研究

它们，找出它们的联系，讲出它们的发展线索，摆在历史发展中来评价它们的正确与错误，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来，这样的哲学史就不会是干巴巴的，就不会是概念化和公式化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就是这样历史地分析了如何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发展到最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列宁称赞他这部书“培养了整整一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不是应该以普列汉诺夫这部书为范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编写哲学史呢！？

唯物论和唯心论

哲学的根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此，哲学命题、哲学原理、哲学体系归根结底有一个究竟它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的问题。哲学上的许多争论往往也是集中在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而展开的（当然，也有唯心论反对唯心论、唯物论反对唯物论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哲学史是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发展史，是可以的。

重要的是，不要将这个命题简单化、公式化，到处乱套。

应该看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区别，在于究竟承认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这一个区分标准是一个抽象的概括，但确实是把握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本质区别的抽象，所以是一个科学的抽象。

但是，第一，这个抽象是马克思主义正式表达出来的。在恩格斯将哲学根本问题明确叙述以前，尽管许多哲学家、哲学史家实际上是按照这个标准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争论，他们之中有些人也多少承认这个区分标准，但大多数是并不自觉地认识这个标准并且承认它的。一直到马克思以前的费尔巴哈还是这样，他将唯物论和它的一种特定形态——庸俗唯物论混为一谈。所以后来施达克将费尔巴哈说成是唯心论者。他

是附和当时流行的偏见，即将追求理想的叫作唯心论，而把注重物质享受的人叫作唯物论者。

这就表明，唯物论和唯心论在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这一点上划分界限，是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这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却并不是古往今来一切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都共同承认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家并不都那么自觉地维护这个划分原则。唯心论者并不那么自觉地维护“意识第一”，并将它贯彻到底，唯物论者也是这样。这种情况在哲学史上是随处可见的。有些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较强，一看到唯物论思想就拚命攻击，如苏格拉底、柏拉图、黑格尔，都坚定地反对唯物论；还有许多唯心论哲学家的党性就不那么强了。即使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也不见得在他们的每一个哲学命题和哲学原理上都能够坚持意识第一的原则。我们不能这样去苛求他们。你看，即使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懂得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科学概念的，并且是自觉地宣称要坚决它的，但难道我们能说我们的理论中就没有一点唯心论的东西吗？当然不能这样说。实际上，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不是也犯了唯心论的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吗？由此可见，在我们进行哲学史研究的时候，不能一说他是唯心论者，就必须将他的一切理论都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丢掉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还有第二，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标准，是一个科学的抽象，所谓抽象，就是将一类事物的共性概括出来。在所有的唯物论哲学中有个共同性即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将这个共性（一般）抽象出来，它反映了唯物论的本质，即唯物论之所以为唯物论，最根本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它就不是唯物论了。可是，这个抽象出来的共性，尽管它是反映了事物的本质的，所以是科学的，但它终究是一种抽象。凡是抽象，和具体相比较，它的内容终究是贫乏的、空洞的。

科学的抽象是很重要的，科学研究决不能离开它。我们研究

哲学史，当然不能离开划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这个科学标准，如果离开它，哲学史研究就无法进行。但是，又必须看到，抽象和具体不同。凡是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事物是具体的，这就是说，它们除了具有共性以外，还有个性；个性和共性相比较，是无限丰富和复杂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都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如果只研究其共性而不研究其个性，哲学史的内容就很贫乏了。

过去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中，有过将哲学家的命题或体系判定为唯物论或唯心论，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任务的情况，所谓“贴标签”就是指的这种情况。应该承认，这种情况在一个时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以前是在资产阶级哲学的影响下，不重视甚至根本不讲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贬低以至根本不讲唯物论的哲学。所以，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要划清界限，强调唯物论的重要意义，在一个阶段内是必要的。这样做确也是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观点的哲学史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观点哲学史的初步工作。

但是，只是停留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是既从具体到抽象，又由抽象回到具体。将哲学家哲学体系归到唯物论或唯心论，只完成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工作，只完成了科学研究的一半，还是比较小的一半；还要从抽象到具体，这就要对哲学家、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它的丰富的内容，找出它的内外联系，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研究哲学史，就不是贴标签，而是具有丰富多采的内容了。

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但是做这样的工作是并不容易的。就以区别唯物论和唯心论来说，抽象地讲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比较容易。而要对哲学家、哲学命题、哲学体系进行具体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并不容易。比如说，每个哲学家的体系中都有几个重要的、基本的术语，这些术语单就其本身来说，很难断定它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在哲